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我所亲历的云大文革运动	马荣升
【广阔天地】	中国知青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王 江
【亲历者言】	追忆文革	臧玉亭
【一家之言】	撤销工作组——《戚本禹回忆录》选载	戚本禹
【史实辨析】	关于《戚本禹回忆录》的对话	唐 燕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我所亲历的云大文革运动

• 马荣升 •

我是1964年考入云南大学的。一进学校，便看到雄伟的会泽院，宽敞的运动场，巍峨典雅的实验大楼和新建的图书馆。校园里绿树成荫，道路两边绿茵铺地，花团锦簇，景象美极了。当时尚未开学，但大学生们已陆续到校了，他们或活跃在运动场上，或在树荫下攻读，……校园显得是那么和谐和充满生机。负责接待新生的高年级学生对我们十分热情而周到，我们内心充满了幸福感，有一位毕业生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们真幸运，赶上了云大最好时期，你们可要珍惜啊！”

入学后不久，我们就领会了那位师兄话语的深刻含义。1960年，高治国调任云大校长，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转变治教和治学理念，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短时间内，云大在云南率先摆脱极左的桎梏。高治国反复强调，学校就是要把教学放在第一位，要保证教学时间，保证提高教学质量，大学主要职责是培养高级人才，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高治国还把这些理念，写进《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里，该文受到了中宣部、教育部领导的肯定，批准刊于《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上，并连同评论员文章向全国发表和广播，该文对教育战线上流行的“政治可以代替一切”、“劳动代替教学”、“反白专道路”等等错误倾向进行了无情抨击，矫正了学校的办学方向，对扭转各级各类学校的混乱局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在高治国的领导下，云大师生的教与学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经过几年的努力，云大的教学秩序得以全面恢复，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空前提高，到1964年已达到最佳状态。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全国局势的好转，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也同步深化。六四年底，四清运动在全国多数农村开展，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政治空气骤然窘迫，校园里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多起来。六五年下半年，政治、中文、生物、化学等系的大部分师生

被迫停下学业，抽往大理州搞四清工作队，其余各系虽在上课，但不时受到各种政治活动的冲击，那些右派教授，历史“不清白”的老师，陆续又被赶下讲台，撵出实验室。

六五年底，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起初我们并不在意，以为与我们理科生无关，只看到报刊、杂志闹腾得越来越厉害，先前占优势的“批姚派”很快就转化为劣势，并纷纷登报作自我批判。

“五·一六通知”前，云大成立了以副校长、著名文学家李广田为组长的“学术批判领导小组”，以领导学校的学术批判，讨论吴晗的《海瑞罢官》中的清官与贪官等学术问题。鉴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讨论并不热烈，此时的云大似乎是风平浪静的。五月底之前，理科各系照常上课，文科是早上上课，下午开批判会。当毛泽东于12月21日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指示传开后，批姚派彻底败下阵来，吴晗落马了。5月10日，姚文元又抛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矛头直指邓拓、吴晗、廖沫沙的黑后台——北京市委，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出台，北京市委被改组，彭、罗、陆、杨倒台，中央文革小组及江青等一千人从后台走上前台，神州大地上空，风云激荡翻腾，真有黑云压城欲摧之势，老师私下跟我们说，一场比反右派、反右倾更为厉害的政治斗争开始了。

6月1日凌晨，我们步入食堂正准备吃早点时，校园里的喇叭一改往常播放悦耳乐曲的常规，反复疾呼，说稍后有重要广播必须收听。七时正，广播里播出的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随后播出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同日，《人民日报》报发表了《融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正式吹响了。曾经试图努力维持有限的教学秩序的云南大学，再也抵挡不住这场革命的风暴。6月2日晨，校党委副书记袁光以低沉的声调宣告：“云大自今日起正式停课，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后各系、级党组织层层布置，号召大家口诛笔伐，把矛头对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向“黑帮分子”开火。我们顺应上级号召，写大字报，开批斗会，首先向老右派，“历史反革命”和反动的学术权威开火，这些人被界定为“黑帮”，之后这批人便遭到了灭顶之灾，家被抄了，并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被冠以高帽，胸前挂着黑牌敲着铜锣游街示众，有的还被剃阴阳头，抹黑手……其状令人惨不忍睹。

云大揭批的第二轮高潮是批斗李广田。李广田时任云大副校长，是中国著名的散文家、教育家，解放后的作品不多，代表作是叙事长诗——《阿诗玛》，后来改编成了电影，李广田担任电影文学顾问，但该电影在文革前夕就被封杀，为批倒批臭李广田，我校师生得以破例观看，我们都被这部艺术性、观赏性极高的影片所吸引。当然观后还得违心地批判一通，说它是宣扬“爱情至上”、“三和一少”的大毒草。李广田的散文《花潮》、《线秀》与《云南日报》副刊“滇云漫谈”均被批为云南文艺黑线的代表作。在全省的报刊杂志上大加挞伐。李广田及其文科的几乎所有老师都被打成黑帮而被残酷斗争，并对他们的人格和肉体极尽侮辱和摧残之能事。

云大从六月中旬以后便异乎寻常地热闹起来了，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奇形怪状的游斗队伍穿梭不停，随处可见抄家、焚书的狼籍景象。一个驰名中外的大学，神圣的知识殿堂，沦为了人间地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云大先后含冤死去的著名学者有：刘尧民、王士魁、何衍璿、李广田、戴钟珩等等。

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和对“文艺黑线”的批判，只是文革的前奏，运动深化的逻辑就是挖出“黑根”。随着“五·一六”通知发表和彭、罗、陆、杨的落马，斗争的矛头直指各级党委，揭发批判窃踞高位的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因领导不力而受到批评，只好采取舍车保帅的办法，忍痛把原云大校长，后调任分管教育，宣传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抛出来，高治国这下可就惨了，他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但在覆巢之下岂能免灾，几经残酷迫害后被逼自戕，幸好抢救及时未死。

随着运动的深入，各大专院校局势一片混乱，为了控制局面，省委分别向各院校派驻了工作组，进驻云大的工作组阵容最为壮观，组长是省委秘书长马文东。工作组进校后就发布禁令，制止抄家和体罚，大字报要张贴在指定的室内，揪斗对象必须经工作组批准，等等。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起了较好作用。然而，工作组暗中对學生进行摸底排队，抓反革命的消息泄露出来。还有传言说“昆明几大监狱在腾位子，准备关学生中的反革命”。引起了不少学生的心理恐慌，表面平静的校园里，一股不满工作组及省市市委的暗流开始涌动。

1966年8月23日，以昆明工学院的学生为主，并有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师院部分学生参加，共约三千多人在昆明工学院集会，在黄兆琪（江苏人，昆明工学院研究生）的率领下，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呼着“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口号，浩浩荡荡地游行示威，队伍沿闹市区进行，先后到昆明市委、云南省委大院闹腾。这次造反行动，史称为“八·二三”事件，这一事件首开云南造反的先河，揭开了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八·二三”事件爆发后，在昆明地区起到了极其强烈的轰动效应，大街小巷、机关、学校议论纷纷，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就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希望乱，有的人指着造反派骂道：“我们这才过上几天好日子，你们是不是又要翻烧饼了！”有从专县上昆办事的基层干部激昂地高呼：“我们信得过以闫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是反革命行动”！

是啊，云南从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严重灾难的阴影中走到现在，不过四、五年时间。和全国一样，云南在中央和以闫红彦为首的省委的领导下，制定和贯彻执行一套适合云南实际的方针政策，着力整顿经济秩序，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经过六一年至六五年一系列艰苦的调整工作后，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六二年基本完成了经济调整，六三年正式成为粮食调出省，六四年人均占有粮食780多斤，每户大牲畜两头、猪3.3头，大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六五年工业总产值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劳动生产率创历史最好水平，全省物资供应充足，市场繁荣，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云岭大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打心眼里感谢党中央，也由衷地爱戴闫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亲切地称“闫政委（闫红彦兼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作者注）是云南各族人民的贴心人”。

最难能可贵的是，闫红彦是冒着极大风险和顶着巨大压力抓云南经济的整顿工作的，当时中央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政治上“左”的错误政策，干扰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整顿工作。而闫红彦却反复强调，云南省情是“民族落后，边疆特殊”，针锋相对地提出“云南农村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开始不久，闫红彦却说“边疆不提两条道路斗争，不搞整党内走资派”。文革初期，他又指示“边疆只进行正面教育”，等等。为此，闫红彦受到西南局主要领导的严厉批评和中央的斥责，被迫做检查，事后，闫红彦感慨地说：“想给老百姓做点好事，真难啊！”

八·二三造反派所列举的闫红彦的一系列“罪状”，恰恰是云南人民公认的丰功伟绩，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的反对，很多工农群众自发地与造反派进行辩论，出现群起而围攻

造反派的场面。8月24日下午，云大师生数千人走出校园，高举“保卫省市委”的大旗，沿大街走向昆明医学院、民族学院，最后到省市委大院，声援省市委。队伍行进中不断有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加入游街行列，声势远比“八·二三”大，造反派的气焰暂时被压下去了，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八·二四”保皇事件。

“八·二三”之后，昆明出现了许多身穿土黄色军装，腰扎皮带，臂套红袖章的首都红卫兵小将，他们是受中央文革的指使，来云南煽风点火的，实际上，“八·二三”事件就是由他们煽起来的。“八·二三”事件以后，北京的红卫兵小将越来越多了，他们到处游说鼓动，在短时间内就发展了很多造反组织，增强了文化大革命的声势，不过，与全国一样，总体上看，运动仍处于胶着状态。

为了打破僵局，毛泽东三次检阅红卫兵队伍，并亲自戴上红卫兵袖套，鼓励青年学生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此，中央文革邀请外地师生分期分批地到北京串连，参观学习北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经验，以推动全国各地的造反运动。9月15、16日，云大师生分两批乘火车直达北京，我们参加了国庆节大游行，接受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首长的检阅，当时心情是十分激动的，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央排名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的刘少奇的无精打采的窘态，预感到刘少奇是不行了。我们在北京期间也参观了北大、清华等首都院校、观看了他们的大字报和一些批斗场面，更多的时间是参观风景名胜，反正吃、住、乘车均免费，致于“革命经验”说老实话，也没有学到多少就是了。

我们北上时，首都红卫兵和北方的红卫兵又纷纷南下，并在云南设立了各式各样的造反联络站，造反声势已盛况空前，云大师生从北京串连返回后，无论从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产生了严重分化，云大乱了，昆明乃至云南也乱了。

我们看着眼花缭乱的局势也坐不住了，几个同学协议了一下也跟着成立了一个战斗队，投入到了革命造反的洪流之中。此时云大，战斗队多得难以计数，大家各自为战，其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战斗队是两支，一支是物理系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另一支是中文系共产党宣言公社，通常是由这两个团队牵头召开批斗大会或组织游行集会。斗争的矛头已不再是指向“死老虎”（校、系领导和五类分子这时已变成了死老虎——作者注），而是指向以闫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和以赵增益为首的昆明市委。不过，云大的造反势头由于有过“保皇”前科，无论怎样做作，都显得底气不足。

昆明工学院是“八·二三”的发源地，在首都红卫兵的指导下建立了全院统一造反大军——《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师院也相继建立了“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大也通过串连建起了统一的战斗团队“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方向东（物理系学生）任司令。此外还有规模相对较小的“云南大学共产党宣言公社”。这两支队伍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配合也较默契。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化，尤其“一月风暴”后夺权斗争的需要，昆明乃至全省的众多战斗团队逐渐进行整合，一般而言，造反精神强的往往与昆明工学院挂钩，名称改为×××“八·二三”战斗队（或兵团），这就形成了八派，而原先“保皇”的或造反迟的人群所组成的团队就与云大挂钩，也就形成了“炮派”。这两大派一开始虽然有着分歧，但在大方向上还是一致的，只是在夺权斗争全面展开后，在干部的保与打方面，特别是掌权名额分配上，分歧也越来越剧烈，甚至由口角之争演变为大打出手，云南两大派的对峙已在所难免。

随着造反大军的壮大，造反声势的激化，在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通过首都红卫兵）指挥下，万炮齐轰省、市委、数万群众涌向省、市委大院，接连几天，院内外队旗招展，口号

声震天动地，扬言不揪出闫红彦誓不罢休，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出面做工作，也被愤怒的人群将他拽上客车车顶。在摧残一番后押向街市游斗。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党政机关和公检法系统受到冲击，全省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全省上下陷入了混乱状况，闫红彦面对这种局势，多次向中央反映，要求中央制止动乱，停止迫害干部，结果招致中央文革小组的粗暴指责。闫红彦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于1967年1月8日晨，吞下大量安眠药，以死抗争，他在遗书中写道：“腾波（即闫红彦夫人王腾波——作者注），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这纸遗书，充分展现了这位开国上将的铮铮铁骨。

闫红彦去世后，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也因庇护闫红彦，对抗群众运动，而被指责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被拘往北京软禁起来，造反派得到中央文革的鼓励，造反派势头更为猛烈，几乎所有的各级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残酷摧残，叛徒、特务越揪越多。1月23日，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央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等项任务，主旨是支持造反派。军队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二月中旬，经中央批准，成立了省军管会，主任是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他在区分谁是真正的左派上，颇煞费苦心，最终在感情上倾向于“八·二三”，这就为挑动两大派武斗埋下了伏笔。

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革命的“三结合”》。云南的两大造反派对哪些领导干部进入“红色政权”问题上产生分歧。在省上，八派争取并支持原省长周兴，而炮派则支持赵健民，彼此争论不休，进而拳脚相加，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在一月至五月下旬的这段时间里，云大师生绝大多数未介入社会活动，理科各系都组织复课，也搞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我作为本系级的小头目，有时也参加学校炮团的会议，致于全校性的集会，我也组织同学们去参加过，校外集会仅参加了一次，而这一次却永远定格在云南大规模武斗的历史上。这一天所发生的事件叫做“五·二八”事件。

1967年5月28日早，我们接到校筹委会通知，叫集合队伍到北郊场参加昆明军区卫生学校“联指”成立大会。我们理科各系及中文系等共约2000多学生，举着校旗浩浩荡荡地开赴北郊场。参加庆祝会的还有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学员，昆明师院等院校的学生。大会尚未开始，“联指”的对立派——“红总”组织了数百人，高呼：“不许老保翻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抬着大旗冲进会场，几个人还直冲主席台，与会议主持人发生冲突，几个维护会场秩序的卫校学员将那几个“红总”战士推下台，并驱逐出会场。大会进行不上20分钟，昆明工学院学生及附近工厂的工人数千包围了会场，领头的高呼“交出打人凶手”。原来是有人跑到昆明工学院，搬来救兵，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此时要出去已不可能了，会场指挥便将参会人员撤入大礼堂，说是已报告省军管会，叫我们耐心等待。但直到傍晚，仍无解围的消息，而包围大礼堂的人越聚越多，已逾万人。我们困在礼堂内，又冷又饿，还天真地等候军管会来解围。然而等来的却是黄兆琪的最后通牒，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时播出通告，勒令礼堂内人们限期出来投降，否则后果自负。我们将各道门堵死，并卸下桌椅的腿、脚，以备自卫。5月29日晨7时，通牒时限已到，黄兆琪下达了总攻击令，随着一阵凄厉的军号声，冲击的勇士们揭开屋顶，冲破大门、窗户蜂拥而入，见人就打，逢人便抓，棍棒敲击声，人们的惨叫声震天动地，到处散落着鞋子，帽子和破碎衣裤。一个个被打伤，打晕的人在地上翻滚，血渍随处可见，真是惨绝人寰！

经过几个小时的搏斗，我们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虏了。被俘的我们双手抱头鱼贯而入工学院四号楼，囚禁在教室里，被关押的人数不下3000人。我在当天下午，趁看守人松懈逃了出来。我是被关押“俘虏”中逃出的第1人，炮派指挥部（炮派指挥部始建于“五·二八”事发当天——作者注）的头头听到这一消息，便把我找去，在了解情况后，又将我送至昆明军区大院内。大院内到处是炮派群众，几辆宣传车的喇叭对着军区大楼高叫：“严惩

‘五·二八’、‘五·二九’肇事者”！“还我红炮手”！“李成芳挑动‘八·二三’镇压红炮手罪责难逃！”……我被推进宣传车，叫我现身说法。我按事实真相声泪俱下地进行了控诉。无疑地，我的控诉激化了围攻军区群众的情绪。

在“五·二八”事件中，受害者除云大、师院的学生外，还有步兵学校、军卫校的学员，而受害面最大，伤得最惨的也是他们，这些学员都是部队选送出来重点培养的尖子。我们的遭遇得到社会、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同情，纷纷指责李成芳“坐山观虎斗”、“拉一派打一派”。有的甚至呼出“向八派，向军内的幕后黑手讨还血债”，有的直呼“打倒李成芳”！

中央文革小组及时地捕捉了这一战机，把昆明“五·二八”武斗事件纳入全国“揪军内一小撮”的战役之中。他们当即表态支持炮派炮打李成芳的革命行动，进一步激化了炮派与昆明军区党委的矛盾和冲突。署名为《评论员》的文章连篇累牍，犹如重磅炸弹轰向昆明军区。后来知道，这些文章都是首都红卫兵的大作，康生多次发指示严责李成芳。康生、江青等还先后在京接见炮派驻京代表及云南告状人员，进一步肯定炮派的斗争大方向，支持揪军内一小撮的革命行动。六月中下旬，中央文革派出了以谢富治、王力等人的工作组奔赴云南，主旨是整顿昆明军区党委班子。他们严厉批评李成芳为首的军区党委，判其犯了方向性、路线性、原则性错误，责令向全省公开检查，李成芳被拘往北京审查。谢、王等随后对省军管会进行改组，由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陈康任主任，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任副主任。

谢富治、王力一行人离开昆明后，又马不停蹄地直奔揪军内一小撮闹得最凶的成都、武汉等地，使两地局势急剧恶化。在林彪、江青的直接指挥下，谢、王等人导演了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人民日报》还发表经中央文革同意署名为“红尖兵”文章，公开鼓动揪军内一小撮。顿时，全国多数省市出现了冲击部队领导机关，冲击军事机构，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风潮，很多地方出现了军队直接介入地方武斗的情况，不少群众组织公然抢劫武装部仓库的枪枝弹药，有的连部队执勤的枪枝也抢去，而有的在与军队首长默契之下，明目张胆地去拿武器以武装自己。武斗已由冷兵器迅速升格为真枪真炮，武斗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惨烈。尤其是江青7月22日讲话，公开号召“文攻武卫”后，全国局势一片大乱。

昆明自“五·二八”以后，两大派之间的对抗急剧升级，通过多种形式，两派都搞到了大量武器弹药，甚至连兵工厂的大口径炮也搬出来了，人们随处可见全付武装队伍在游弋，昆明市区、四郊随时可以听到激烈的枪声。昔日繁华的正义路、东风路，如今店铺关闭，门可罗雀，并不时有街道行人被冷枪击毙。有一次，东风西路下水道因堵塞而导致臭水四溢，掏出的堵塞物却是具无名尸首。我曾亲见一小孩到东风商店大楼前捡子弹壳，被大楼里的狙击手打死，中文系一个老教授的幼子，在家门外生炉火，也被冷枪击毙。

8月27日，炮派因本派人员被对方残杀，而在昆明东风广场召开“文攻武卫”誓师大会。会议快结束时，接到情报，说是将有八派要血洗省军区（省军区属于亲炮派一作者注），炮派总指挥沈昌雄决定派兵支援，昆明师院当即组织近百武装学生，直奔省军区，他们乘坐两辆黄河牌大卡车快接近军区大门时，遭到先期设伏的机枪手的狂射，当场击毙8人，送至医院因抢救无效又死去一人。9个鲜活的大学生，刹那间就因“误会”而惨死。整个师院沉浸在一片悲恸声中。

“八·二七”之后，又有云大、医学院及工学院的学生相继被杀害，医学院死难的学生还被活活地挑了双脚筋，凶手是谁，我敢说，至今仍是谜。

六七年八月以后，两大派的武斗迅速蔓延至全省，为统筹掌控全省武斗局势，两大派先后组建了总指挥部。八派的总指挥部设在工学院，总指挥是黄兆琪、杨树先、刘殷农，炮派的总指挥部原设在五华山，总指挥是李毅、杨凯、沈昌雄，后因五华山太靠前，又移驻云大。反正当时云大学生也差不多走完了，空房有的是。炮派指挥部驻会泽院，四周岗哨林立，并砌有暗堡，令人望而颤悚。两派均派驻京代表各自保持与中央文革及首都红卫兵总部联络，并都宣称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江青同志，哪怕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两大派头目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或间接（通过首都红卫兵）的操纵和指挥下，把云南的武斗规模和惨烈水平推到登峰造极的境地，演绎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1967年12月28日下午，炮派指挥部在云大大礼堂召开了团队长会议，我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的主旨是“收复被八派占领的黑林铺地区”。由沈昌雄作战前动员。令我等惊奇的是，居然有很多团队长踊跃报名担任主攻或突击队，最后由几个军事工业单位承担攻击任务。12月29日夜晚，只听到昆明西郊枪声大作，炮声隆隆。经过一夜激战，炮派以伤亡近百人的代价攻下了黑林铺。30日凌晨，指挥部通知物理系、化学系的护校队前往黑林铺后山伏击突围逃出来的“匪徒”。七时许，领队的校革委副主任周律型，看到溃逃人群多为老弱妇女，足足有一千多人。此时，周律型严肃地宣布：“大家听我指挥，撤”！伏击的学生们纷纷收捡起卡满子弹的轻重机枪，匆匆撤回学校。由于周律型的明智之举，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至今回想起来尚心有余悸。

当我们回到学校时，看到一批批双手抱头的“俘虏”，他们被荷枪实弹的“红炮手”押进大礼堂囚禁，总数至少有八九百吧，几挺卡满子弹的重机枪对着礼堂大门口，夜晚传来一阵枪声，听说是击毙了一名企图逃逸者，此时的云大变成了一个集中营，给云大蒙上了耻辱。

“黑林铺大捷”后，炮派又趁势拔除了八派的几个据点。八派也组织了有效的反击，相继在北郊、南郊清除了炮派的据点，炮派被驱赶出来的人群扶老携幼地住进了云大。云大主教学区——四合院住满了难民。时值隆冬，难民们为了烤火取暖，将好端端的桌椅劈了烧，雪白墙壁熏得乌黑，到处是垃圾、粪便，过往行人为之作呕。卫生科室内、过道里住满了伤病员，伤员的呻吟声，小孩的哭闹声，大人们呵斥声，闹得个沸反盈天，此时的云大简直成了一个巨大的难民收容所。

昆明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很快便波及全省，几乎所有各县都大干起来了。文山、广南、下关、腾冲、昭通等地还动员了武装民兵进城搞武斗，过去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野战”，“攻坚战”，“麻雀战”……在云南都变成了现实，武斗就象一架巨大的运转着的绞肉机，将难以计数的人们吞噬，仅下关一次武斗，两派死亡人数超过300人，真是骇人听闻。据估计，云南全省在武斗期间参战人数近百万人，阵亡人数至今尚无精确数据，有说是7万多，有的说超过10万，至于伤残者那更是无法计数，而公私财产的损失恐怕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1968年8月21日，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把炮派支持的赵健民抓到北京。在京西宾馆，康生以相面术把赵健民诬为叛徒，捏造他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说他支持炮派搞武斗，组织“滇西挺进纵队”这个反革命别动队（滇挺案已于1975年予以平反——作者注），目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等等。随后便由谢富治宣布将赵健民逮捕入狱，这一关就是8年。炮派，一个拥有300多万人的群众组织，由于保了“大叛徒”赵健民，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一夜之间，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

8月初，中央决定派谭甫仁到云南主持工作。他在昆明军区的“八·八”讲话，下关的“一二·一九”讲话中，把陈康、张力雄及一大批军队干部打成赵健民阴谋集团成员，公开支一派打一派。他在六九年元旦讲话以及省革委第六次、第七次全会上，公开提出的“以人划线、以派划线”的政治方针，血腥地开展“划线站队”运动。为了在全省推开划线站队，决定从云大开刀，从而一手导演了震惊全省的云大“一·六”事件。

1969年1月6日，在云大大操场召开了“划线站队”的誓师大会，为了在气势上彻底压垮云大师生，还招来外单位队伍，参会人数上万人，而当时云大留校学生只有两个级1200余人，当天，我与140多个师生被五花大绑地押跪在大礼堂前石阶上接受批斗，被批斗者每人都头戴高帽，胸前挂巨大黑牌，黑牌上写着“坏炮头”、“反军乱军分子”，“赵氏爬虫”……我们每个人后面均站着一个手持皮鞭或棍棒的工宣队员，伴随着会场上的每一次呼口号，我们便遭到一顿毒打，不时有人被折磨得昏厥过去，鞭笞声、哀叫声不绝于耳。

“一·六”之后，驻校工军宣队在省革委会的直接指挥下，掀起了划线站队的高潮，把云大绝大多数师生都打成“站错队”的分子，驻云大工军宣队队员最多时达到1000多人，接下来，在1月14日、19日又分别召开了规模更大的批斗大会，被揪斗和关押的师生越来越多。工军宣队在云大私设监牢、看守所10多个，被关押的师生员工达200多人，被迫检查、认罪 of 占全校师生员工总数的80%以上，外语系六九级英专二小班，仅有学生19人，被批斗的有16人，被长期关押的竟有9人；中文系68级，共有学生59人，被迫检查的有43人，被揪斗的有14人，被关押的有6人。工军宣队用尽了攻心战术和严刑逼供，抓出的现行反革命达100多人，他们只等上面批复下来，便予以无情镇压。

云大这个蚂蜂窝被捅开后，划线站队便在全省铺开了。刹那间，云岭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各个单位都设立公堂、牢狱，对站错队的群众进行了残暴的刑讯逼供，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划线站队”运动中，云南大批干部，群众被扣上“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帽子，遭到诬陷迫害，14000多人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者不下百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不在少数。

“一·六”事件以后，云大学生就以各种形式进行过反抗，七月下旬之后，以外语系张必居、苏跃宗等人为首，通过地下串连的形式，联络了各系有反抗精神的同学，与驻校工军宣队作斗争，我和物理系的丁恒杰，陈贻等人也成为其中的骨干，我们或在校外同学家中，或在翠湖公园林荫下密商，决定了以下几个事项：一是写匿名信向中央控告；二是分别串连师院、总站等几个单位的原炮派骨干，广泛发动群众，先地下后公开与谭甫仁斗争。后来决定8月1日将反抗活动公开化。7月31日晚，在文林街、云大校门口刷出了反对谭甫仁、反对划线站队的大标语，八月一日凌晨，在云大大操场旁的大字报栏内刷出的大标语尤为醒目，字体比斗大，上书“谭甫仁必须向云南人民低头认罪！”吸引了校内外群众热议。

此后，方向东等人直接赴京向中央控告谭甫仁利用划线站队，搞乱云南、迫害军内外干部群众的罪恶行径。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央的注意，八月上旬我们通过内线得知，中央即将派出4名记者到云南了解划线站队的情况，内心十分激动，我们分头将消息传递给相关人员，并通知作好汇报的准备工作，8月14日傍晚，由张必居、苏跃宗等人向中央派来的记者汇报，并约定次日上午在云大大礼堂内公开汇报，这实际上是公开控诉。

8月15日上午八时，当我们冲破工军宣队的阻挠，来到大礼堂时，大礼堂内已经坐满了人，大家群情激昂，受害者将大量划线时，所使用的高帽、黑牌、绳、棒及其凶器，还将本人伤残照片及批斗现场照片展示给记者们看，很多人争相上台控诉，台上台下一片抽泣声，一桩桩、一件件血泪史实，充分揭露了谭甫仁及其追随者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滔天罪行。我看到记者们也为之动容，他们答应一定要把大家的声音及了解的情况，如实地向中央汇报。

谭甫仁待记者返京后，便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反“右倾翻案风”，“右倾分裂风”的运动。云大工军宣队随即将我们几个发起人控制起来，将所有控诉人及反抗者送进校外学习班，开展批判斗争。

1970年7月中央下达关于六九、七〇、七一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由于云大学生绝大多数属“站错队”的，分配工作时倍受歧视，被解放牌车一车车往各专县运走，我也在被运走的行列中，就这样离开了深深眷恋的母校，也离开了云大的文革运动。

参考资料：

- △ 《云南少数民族的知心人闫红彦》，载2005年第五期《炎黄春秋》。
- △ 原云大革委会副主任周继文：《致周兴省长的一封公开信》。
- △ 《康生其人其事》，载《共和国历程》。

□ 来源：云南大学档案馆

~~~~~

【广阔天地】

中国知青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 王 江 ·

1998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沉寂了一段时间的知青话题，忽然又热了一阵，又出版了一批知青题材的图书，遗憾的是，除了知青老照片的选本能火爆一气，文字为主的大抵炒冷饭。报纸上的评论文章，多是冷言奚落。总是插队那点事，像祥林嫂总是反复叨唠孩丢了：“我真傻……”听者越来越少。

有位著名的知青作家，在这一年勉强写下一篇有关知青的文字，然后郑重声明：就这一话题，从此封笔。

没有新意，他们谈腻了。不让他们再谈知青话题，他们会感恩戴德。

十年前，《北大荒风云录》出版时，声称知青话题是“超世纪的话题”，终于到了新世纪的门槛，竟气喘吁吁，迈不动了。

依我看，知青话题刚有个序幕。十年虽有几个高潮，但大抵是凭感觉而论，凭感觉就能找到真理，还要哥白尼干什么？

出了几部知青运动史，有价值，但不能代替理论思考。

就连中国知青这一群体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大致轮廓，都还没有说清，模糊观念盛行，怎能说知青话题没话可说了呢？

本文就这老话题谈几个新观点。

◇ 上山下乡：耽误人才，还是造就人才？

成千上万的人一齐回答：当然是耽误人才。上山下乡整整耽误了一代人；尽管今天是骨干，但没有上山下乡运动，他们会更辉煌。

也有说上山下乡好话的。但人们说，那是知青中的佼佼者。成功了，就把苦难说成黄金。成功者在知青群体中只占极少数。一阵一阵的“知青热”，就是少数知青名人“炒”起来的。

说这话的，大抵并没有见过几个知青名人，只是闭眼一猜。

知青名人的名片，我家里攒了一箩筐。

我曾经像新闻记者那样，对他们一一采访。我的问题比较尖锐，请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太爷是干什么的？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你爸爸……“文革”前你读的什么学校？成绩怎样……

这样调查完毕，材料一整理，我的结论是：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可以当作家、当学者、当教授。他们本来就是那块料，甚至祖坟上就有那么一根蒿子！他们并不是上山下乡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当然主要是奋斗成才，但那成功与上山下乡并没有多少必然联系。

上山下乡对他们的命运有影响吗？有。如果没有上山下乡，他们可以当大作家、大学者、大教授。有了这段经历，他们只能当小作家、小学者、小教授。这些人可以说，确实被上山下乡耽误了；如果没有上山下乡他们会更辉煌。所以，他们并没有说上山下乡几句好话，只是在大段抨击之后加个小尾巴，说是“当然了，也有收获”云云。

作为广大普通知青，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将是什么命运？会更辉煌吗？我又搞了一项调查。这回主要不是采访，而是钻北京图书馆，一钻就是一整天。

那里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查来查去，我查出一身冷汗。“文革”前夕，我们国家的教育状况大致如此：每年的9月1日，有1800多万男儿童上小学一年级；十二年之后能上大学的不到18万。大多数青年人当时只读到小学、中学，就不得不就业了。在农村的，打渔种田，城里便是做工买菜。在平凡年代，提倡螺丝钉精神，想跳槽没门儿。把辉煌二字拓展为“掏粪工也有出息”是另一回事，否则，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广大普通知青，又能辉煌到哪里去呢？

但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老知青，都感到这一代人被严重的耽误了？这里有一种错觉。

假设有一位北京女知青，胡同里长大的。“文革”前上的是二三类初中，成绩一般。身后弟妹成群。父亲小学文化在前门大街一座老铺子卖书。家里希望她早点就业。女孩子卖卖

油盐酱醋就行了。她自己的理想是卖书。但是上山下乡把她发到北大荒种地。她不甘心，十几年后回城在北京一家商店卖百货。看到老同学考电大、业大。她也考过，但总不中。知青聚会，她满腹牢骚：我在北大荒当过民办教师，哪是站柜台的命？都让上山下乡耽误了！

这就是知青情结的本质。有积极意义，也有错觉。

在平平淡淡的岁月，作为普通人家的子弟，对那些专家学者子弟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上山下乡，都一个鼻子两眼，发到穷乡僻壤。返城之后各奔东西，二三十年见层次。老知青聚会，有专家学者，也有做工的、卖菜的。当初不是一起种地、一起偷鸡摸狗吗？于是，“专家学者宁有种乎？”。

这是一种乱世心态。

同逆境作斗争，斗红了眼，刹不住车了；早就说过了而立之年，还确定不了自己的社会位置。

他们不认原来的命了，人心不古了。这就是上山下乡所塑造的整整一代人的性格。

◇ “上山下乡”一词不可误用

还有一种观点：上山下乡也有收获，锻炼出了一批人才。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上山下乡一词，或被成千上万的人滥用了。

老知青们动不动就说，上山下乡使他懂得了这个，懂得了那个。有位老知青说，贫下中农教他懂得了“性”。田间地头的“荤笑话”，比学校生理卫生课生动、透彻。

我相信这是事实，但把这叫做“上山下乡的收获”则不妥。假设这事发生在70年代初期，当时让你谈上山下乡的体会，你说贫下中农对你进行“性教育”，立刻会被打成“反革命”，因为你“篡改”毛主席语录。今天虽不扣帽子了，但你的说法还有语病：偷换概念，你分明改变了上山下乡的原意，却仍说是上山下乡的“收获”。

同样情况，我也常说“上山下乡把本来默默无闻的一代人激活了”等等，我是被大多数人搅糊涂了。都说“司马缸砸光”，我也跟着“砸光”了。其实，说“司马光砸缸”小学生都懂，用字颠倒，则博士生也困惑。

这是知青话题争论不休的一个根源。

上山下乡一词不可误用，必须符合其发动者的原意。如果早就变了味，甚至满拧，那么，准确的提法，是在“上山下乡”前加一“反”字。

但“上山下乡”前加一“反”字谈何容易。彻底否定“文革”不等于彻底否定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终于1980年，有25年的历史，新中国各时期都有。历史背景那么不同，如果发生在西方，学术界早就在后来者前加一“后”字了，我们却仍然不改称呼。

总是不知到底怎样评价，是知青话题混乱的根源。

不管怎么说，谈到“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那种逆向收货，在“上山下乡”前加一“反”字，至少逻辑上通。

“文革”知青运动史的主流，应是“反上山下乡史”。其大约始于1970年。在此之前，虽也轰轰烈烈下去，但知青大多十六七岁，没有成年，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按今天的规定，连雇佣他们做工都非法。发动这一场运动的功过是非，与知青本身无关。

知青们成年之后，确实应由本人负责的行为，不少是违背上山下乡发动者初衷的：偷鸡摸狗、偷看古书、偷唱“黄歌”、偷着做爱、偷着探亲、偷看数理化、偷谈人本主义……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反上山下乡运动升级，由偷到骗。没病说病，骗一纸返城证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自发返城的知青数已约占1967年以后上山下乡运动者的半数了。剩下的只是一时还没有门路。后来是一系列极端行为：请愿、上访、静坐、卧轨……三中全会后，得到中央支持。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反上山下乡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实现了“胜利大逃亡”。

老知青们挂在口头的“收获”，基本上都是反上山下乡运动的战果。但少一个“反”字怎能不被人误解？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不清了。

◇ 我们能否摆脱千古悖论

把上面的思路一清理，就发现这样的大致规律：

上山下乡，无疑耽误人才。不同层次的知青，有不同程度的耽误；层次越高，耽误越大。但反上山下乡，却可以造就人才。不同层次的知青，有不同程度的造就；层次低些，造就反而大，但不能过低。

站在历史的高度一看，这样的造就人才，当然不是正路。知青人才结构严重地失衡，舞文弄墨的太多，科技界却出现大裂谷，国民经济发展被严重阻碍。从根子上说，“文革”期间的那种上山下乡运动是一种灾难。再也不要重演了。

但对于已经发生的一段历史，则何必一味的“假如没有”？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因为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人才。

成千上万的人都说：知青人才当中极少搞理工的，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前半句不错，后半句则太绝对了。当今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是知青出身，他进过美国加州喷气推进实验室，是继钱学森之后被允许进入的第二个中国人。那太特殊了，人们说，他的成功与“反上山下乡”绝对没有联系。

起初，我也这样想。我采访他的目的之一，就是找出其成才的特殊性，以便在研究知青课题时作为特殊，排除在外。

但采访之后，我大吃一惊。

他是辽宁知青，上山下乡时的六九届初中生，家庭没有搞科研的背影。在内蒙兵团先是务农，后开卡车。在几百里渺无人烟的地区行车，必须学会修车，他养成了很强的设备拆装

能力。他的所有机遇，其他知青都有。所不同的是，他全部抓住了，一直读完“博士后”。他回忆说，他搞科研竟用上当年修车时的拆拆装装的本领。有不少知青都说，到国外读博士，常常是其他学生下课了，自己一个人关在实验室里摆弄设备；搞出点儿名堂，靠的是知青时代养成的动手能力。

在牛顿、爱因斯坦时代，当自然科学家很难。但今天，在自然科学上要有所发明，先进的实验条件越来越重要。牛满江是童第周的学生，某些成果超过老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美国，实验条件好。80年代初有人做过统计，我国100位科技人才，近半数是自学的。后来赶上好的实验条件，可以扬长避短。

我的新思路是：如果时代需要知青群体多出理工人才，数量不够，它会努力成批地制造出来！

尽管这些人，昨天还都是泥腿子。但这一代人年富力强的时期，最尖锐的课题，既不是“三弹一星”，也不是电脑互联网，而是拨乱反正。

战争年代那么多高智商的人不搞科研，他们成了元帅，成了将军。和平年代，体制转型，则需要笔杆子。在青黄不接的时期，要有人用肩膀架起一座浮桥，为即将开始的科研大反攻，应得准备时间。当博士、硕士的大部队浩浩荡荡踏着浮桥开上前去的时候，架桥人已经鬓染秋霜了。每代人各领风骚。

历史步伐应当加快，但毕竟不能一步登天。

这样看来那些发轫与反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人才，就不但不悲凉，反而别有一番风采！他们普遍存在的那股难以衰竭的活力，竟有令后面几代人望尘莫及之处。

知青们说：蹉跎是财富，苦难是黄金。

后来者可以嘲弄这种说法，但走路又难免不被他绊一下。这是因为，它的发明权不属于知青。古今中外类似的格言，成百上千。我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名言就是它最好的注脚：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但我致力于读懂孟子这句话凡四十年，才读出他的潜台词，破译出来竟是：人是贱骨头。

这是人类的千古悖论。也许人真的并非宇宙精灵，怪不得近几十年有寻找地外文明的热潮。

这是知青话题涉及的最大的人生哲理，最深的人文思考。

摆脱这种悖论的药方是四个字：居安思危。不知后来的几代人有没有这种志气。

#### ◇ 为新世纪的老知青算命

以上一路分析到此，中国知青的昨天、今天的大致轮廓，已经若隐若现了。这些人成长在共和国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遭遇的上山下乡，是人生道路上空前绝后的磨难。有人说：几亿农民长年累月那样生活，怎么不诉苦？这是隔靴搔痒的说法。成千上万的知青

已经用事实证明，他们当年的处境远不如农民，他们比农民更多的是精神磨难。鲁迅先生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物极必反，他们用各种方式，抵制、反对上山下乡，最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取得决定性胜利。

带着一种不向厄运低头、敢同逆境抗争的不屈不挠的性格，他们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参加高考，上电大、业大、函大。一场大补课，使这一代人所拥有的文凭数量，迅速超过了上一代人。层次虽是以大专居多，但相对于他们所负担的历史任务，即拨乱反正来说，大致够用。当致命的缺陷逐渐显露出来时，新一代已经走向成熟。

在共和国50年的历史上，乃至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一代人的价值何在？新的社会环境在他们身上造就新的社会特质，其中有很多东西，就像他们上山下乡期间晒黑的皮肤、磨厚的老茧一样，只属于他们自己，绝不会遗传后代。但也有一些东西，同他们染色体上的遗传基因有关，基因的某种自然变异由于适合新环境而迅速扩散，无疑对后代有影响。他们的品性，是中华民族传统（以优秀为主）的继承；凭着这一点，他们能自发地抵制、反对上山下乡。但是，如果他们只是把传统接过来，原样翻版，没有注入任何新内容，那么，这一代人就算白活了，一死便朽。他们肯定在传统中注入了新内容。

究竟什么东西，是新环境助长的这一代人的基因变异？他们究竟给传统注入了什么新内容？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在不断用超常的困难作斗争过程中，中华民族养成一种不屈不挠的英雄性格。从大禹治水、修筑长城，到红军长征、抗击日寇，从开发大油田到粉碎“四人帮”……在超常的困难面前，主观能动性超常发挥，发挥到极致。中国知青的反上山下乡，大返城之后的一二十年辉煌，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所不同的是，以往的超常发挥，是群体行为占主导，而这回：除了反上山下乡期间有一些群体行为，大返城后，全部分散为个体行为。

个人奋斗，曾经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划等号而遭批判。但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评价改变了。60年代出生的人，据说有全新的价值取向，诸如自我实现。其实，那是知青一代开的先河。“解构的一代”的解构行为，在上一代早就开始了，是以“偷”字开始的。其实，这两代人是兄弟姐妹，没有什么代沟，特别是姐妹们到了中年，洗去几分浪漫，而姐妹们再洒脱一些之后。

主观能动性的超常发挥，作为一种个体的普遍行为，使知青一代人与他们的上代（不仅父母，也有祖父母）、下代（子女）都拉开了距离。上代不是“个体”，下代不是“超常”，即便有超常也不普遍。

要想描述知青精神、知青性格，必须找出其最大的特色。

这一代人的人生注定不平凡，也无法平凡了。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高中三年数理化，有人学都没学过，却要用几个月的时间突击掌握。这一代人的生路，充满这种残酷的遭遇战。

到90年代，这一代人甚至在并无遭遇战的情况下，也主动出击去创奇迹，好像红了眼的赌徒。在某些领域，博士们认为根本做不到的事，他们敢做。

有人说这是“活得最累的一代”。累未必是坏事。像以往那种尽是不情愿的累，也许折寿，但目前的主要危机其实是“闲”。正常年代成长的人，50岁时松口气未尝不可，但知青一代不行。这和运动的道理一样。运动员超常运动，体型健美，一旦停滞，却立即发胖，比常人还难看。

有的老知青，一松气，50岁的人立即呈现出60岁人的心态。

日本有个长寿协会，几千会员都想长命百岁。他们的诀窍是永远有个奋斗目标，勤于进取。

知青一代已经干了几件大事，剩下的时光，能不能再干一两件事？只是一件也好。这要各尽所能。已经有群体走向个体，就不会也不应有什么统一行动。

作为老知青，今天，如果你是个清洁工，不要像年轻人那样鄙视这一行。好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天都不能停止收拾垃圾的工作。发达国家那种文明的清洁工作，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学一学？博士们说不行，你呢？

如果你是个卖菜的，在老龄化社会日益迫近的今天，很多老年人需要送菜上门，但对一般个体户信不过；那么，你能否以老知青的道德声誉，独树一帜？

如果你在领导岗位，那更任重道远……

下个世纪，毫无疑问，不消几十年，这一代人就全部到了退休年龄。沉舟侧畔，千帆竞发，未尝不是好事。有终生耿耿于怀的，面对那亏损的赤字人生，始终不能像孙悦唱的那样“洒脱一些过得好”。但一生无怨无悔的会更多。

这一代人有先天的致命弱点，在很多领域会提前被淘汰。但作为补偿，不止还有多少领域，他们会突然大爆冷门。如同一个人眼瞎了，耳朵便格外灵。这一代是不寻常的一代，多“怪才”、“鬼才”。有谁认为他们在新世纪会迅速地全面衰落，将犯战略性错误。

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以色列建国以前的犹太人之谜，研究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奋斗几十年后形成的那知青的某些特色，与他们有惊人的相似处。

知青话题无疑是超世纪的话题，它蕴藏的社会、人生、人文密码太多了。

□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1999年第6期

~~~~~

【亲历者言】

追忆文革

• 臧玉亭 •

1966年5月，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兴起。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贴出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这是1957年“反右”以来北大第一次出现的大字报，其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毛主席见到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并评价说，“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且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还要求当晚在电台广播。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在北京大学点燃了。

北京中学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清华附中开始点燃的。1966年5月底，清华附中的部分高中同学提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矛头直指校领导和所谓的“资产阶级路线”，并成立了“清华附红卫兵”组织，这是北京乃至全国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中央广播电台和各个报纸舆论的宣传下，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都动了起来。我们班的张朝从外校参观回来后，在班里起草了大字报，矛头直指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回到班里看到了这张大字报，觉得符合毛主席的号召，也符合当下各个学校的形势，因此我义无反顾地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上了我的名字，在六月初的某天（哪天我忘了）下午贴了出去。紧接着胡琦、曹珺贴出不同意我们意见的大字报。当晚，我们班大部分同学聚在张志强家，连夜讨论，以班级的名义写大字报，提出“折中的意见”（郭怀海语）。真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全校就贴满了大字报，有支持我们观点的，也有反对我们观点的，从此二中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式拉开了帷幕。此事还惊动了我的父亲，他亲自来校看了大字报。没有几天，学校就陷入了一片混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破了，学生和教职员工围绕保校领导和反对校领导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校领导和部分老师也受到了冲击。根据北京大、中学校混乱的局面，为了更有效的领导各个学校的文革运动，上级很快就派来了工作组，并成立了校临时革命委员会，我被推选当了校临时革委会的主任。我当主任期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其他中学组建红卫兵的情况，也组建了二中的红卫兵大队；第二件事就是组织发表了北京二中红卫兵宣言——《最后通牒——向旧社会宣战》。

1966年8月17日夜，我和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聚在一起议论，根据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为此，在我的组织下，由我校红卫兵头头之一、高三同学冯晓新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的北京二中红卫兵宣言，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四旧”，中央没有说明。

8月18日这一天，北京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戴上了红卫兵献上的袖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大会实况，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介绍了红卫兵。也就是1966年8月18日的下午，我们就向社会散发了宣言，几个报社也在头版刊登了宣言。从此，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我们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

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原置身事外的学生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当时的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例如，人民日报的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一时间，基本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基本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和私生活领域，基本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被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和神符魔咒。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道德规范、行为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和传统的禁忌，把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为红卫兵在1967年的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一部分人开始加入到这场看似“疯狂”的运动中，另一些人则像受了催眠术似的听之任之、逆来顺受。文革中，破“四旧”最后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也违背了我当时组织发表北京二中红卫兵宣言的初衷。尤为过分的是，我校部分红卫兵到社会上抓回了一些所谓的“女流氓”到校关押拷打，因我们学校是男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在我的怒斥和干预下，第二天就都放出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心里还是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内疚。

1966年9月15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我和我校的冯晓新同学被推荐上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在天安门城楼上，冯晓新代表红卫兵发了言，我也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非常荣幸的与毛主席握了手，同时也见到了周总理，聆听了他的教导。周总理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要遵守纪律，做党的好孩子”。另外，我也见到了我敬爱的朱德总司令，也与他老人家握了手。回来后，因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我整整兴奋了3天，更坚定了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文革”江青、康生等人的操纵下，用所谓“抓党内走资派”的名义，矛头直接指向了老干部。群众组织也纷纷成立，中学的学生主要分为“红卫兵”、“四三”和“四四”，从此学校大乱，无休无止的辩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混乱的缠斗，同学之间感情的撕裂，真是使人身心疲惫。在此情况下，我也受到了冲击，学校不知是哪派的学生在我家的门口和街道的墙上也贴了很多的大字报；同时，我的父母和亲戚被做为“走资派”也受到了批斗。从此，我对文革运动产生了消极情绪，离开了学校，与要好的几个同学如虞和、黄晴等就到全国串联去了。一直到军宣队到校军训后，我才和同学们陆续返回了学校开始进行军训。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我们高二（3）班也分为了“红卫兵”、“四三”和“四四”等派别，但我们班有良好的基础和素质，除了个别同学在“破四

旧”运动中有过激的行动外，绝大部分同学之间并没有互相伤害，到现在感情都还是很融洽的。

□ 来源：新浪博客

~~~~~

## 【一家之言】

### 撤销工作组——《戚本禹回忆录》选载

• 戚本禹 •

〔摘自《戚本禹回忆录》 第三部分：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 第九章：撤销工作组〕

#### 3、毛主席下决心撤销工作组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没有立即表态。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他看了很多材料，尤其是北大、清华、北师大材料。听江青说，主席看了那些材料以后心情很不愉快，说过大致这样一番话，看到群众运动一下子由热气腾腾变得冷冷清清，学校的大门都关了，心里很难过。有些学校的工作组明目张胆地镇压学生运动。历史上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国民党。这是很大错误，方向性的错误。要赶紧扭转，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看到学生起来给党委提意见，就出来立规矩、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什么正轨？其实是邪轨。有的工作组给学生戴反党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现在变成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阻碍了，要改变这种作法，撤出工作组。你们要下去，到群众中去看一看，去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子里，下去头脑就会清醒一些。把工作组撤了，让黑帮停职反省。让这些学生、老师中的革命派，加上中间派的人也参加一部分，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文化革命斗争。斗什么？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斗争反动学术权威。对吴晗、翦伯赞这些人谁更了解他们一些？还是革命群众。像工作组那样搞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北洋军阀、国民党不是都失败了吗。江青向我们转述了主席的话，我们感到心情沉重。从主席的话里，我听出来主席这时已经对江青、陈伯达、康生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进行了郑重的考虑，并已经有了决定了。

1966年7月24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主席接见了中央文革全体人员。陈伯达、康生、陶铸、江青、张春桥、尹达、王力、关锋、我、穆欣都参加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向主席汇报了情况，主席讲了话。我当时有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

毛主席在讲话中，主要讲了要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来搞等内容，同时还说了许多鼓励我们的话。他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书记处也不行了。你们文革小组，是代表群众的，做了不少好事，群众最拥护你们，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现在群众拥护戚本禹、关锋他们，不听自称代表党中央的工作组。主席还引用了一句古语“天下人不之丹朱而之舜”，意思是说现在群众有问题找中央文革，不找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了。主席之所以表扬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学生受压制时公开表态支持了学生。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华北的李雪峰，东北的宋任穷，中南的王任重，华东的陈丕显等各大区书记都参加了。在这个会议上，主席讲了话。主席在讲话中继续批评工作组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批评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工作组，批评他们不许群众向中央反映情况，不准他们打

电报给中央文革。主席说，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凡阻碍运动的，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是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的。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起来闹革命。

主席还说他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后来不赞成了。张承先的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是起阻挠革命作用的。主席还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革命运动。天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跑，没有感性知识，怎么指导运动！毛主席说全国90%以上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建议中央下令撤销工作组。

主席这次讲话非常重要，表明主席已经下了要和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斗争到底的决心。而且主席的态度非常鲜明，在接见我们之前，他虽然反对压制群众，但还没有正式提出撤销工作组。主席决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和刘少奇斗争这样重大问题，他会找很多人来谈话，看很多数据，考虑很多问题，然后才下决心的。他的这次讲话，向我们明确表态反对派工作组，而且认为派工作组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应该负责。主席还说，召开派工作组的会议的时候，我不在。是他们主持的，我不知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他又对我们说，你们都应该到群众里面去，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听了主席的讲话以后，我跟关锋说，我们俩应该写一篇文章了，把主席最新的精神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写了一篇《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文章，作为《红旗》杂志社论发表了。这个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学生们都把文章里面重要的话做了摘录，抄写成大字报贴出来，后来人民出版社还出了单行本。

主席的表态，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在这期间主席还有几个重要讲话，有些我记不准确了。好像是刘澜涛还是谁，曾整理过一个材料，里面有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多次讲话，其中包括接见大区书记时的讲话，比较全面，可惜我找不到了。我记得这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不是跑各个大学，就是参加各种的会议。每天每人要工作差不多18个小时，很紧张。

#### 4、陪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江青、陈伯达都到北大等学校去看了大字报。听说主席自己也在一个凌晨悄悄地去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主席对刘少奇他们说：中央文革现在都下去了，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跟群众在一起，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1966年7月25日以后，中央领导就分头到各大、专院校和中学去。总理去清华和第二外国语学院，邓小平去人大，江青到北大，我和关锋到地质学院、北师大，王力到中学。

刘少奇选择了建工学院，他让中央文革派一个人跟他一起去。他先叫陈伯达去。陈伯达一看刘少奇挨主席批评了，他哪里还敢和他一起去啊？但刘少奇当时还是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他也不敢得罪他。于是他叫王力、关锋去。可他们都说晚上有事，去不了。陈伯达就对我说，没办法了，只好你去了。我也不愿意去。我说，江青叫我今天晚上跟她一起到北京大学去，我答应了，不好改。陈伯达就说，江青那边，我帮你去请假，你今晚就不要去北大了。刘少奇这边，他要中央文革去一个人。他是中央的副主席，他说要人去，我们一个人都不去，我怎么交待？你必须去，没有商量。我没办法，只好去。

第二天，中央文革开小组会，江青知道我跟着刘少奇去了建工学院，向我发了火。她说，你怎么跟着刘少奇去建工学院？不是说好跟我一起去北京大学的吗？我说，我是说好跟

你去北大的，但是陈伯达一定要我去建工学院，他说他负责帮我向你请假。她说，他什么时候替你跟我请假了？问陈伯达，他又是照例地装糊涂，说他忘了有这事。还好关锋在边上给我作了证，说的确是陈伯达要老戚去建工学院的，老戚说，他已答应江青同志一起去北大。江青知道了事情经过，就反过来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说，既然如此，那就不要去了。后来主席听江青说了这事，说，你们当初答应让戚本禹陪着去是不对的，现在答应去了而又不去，那也是不对的。江青从主席那里回来，向大家传达了主席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主席说的对，我应该继续跟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果然，在我陪这刘少奇他们再一次去建工学院时候，就受到了建工学院工作组有组织的围攻。在开会的时候，工作组的人就说我支持反动学生，支持反动言论，对我进行上纲上线。还把她们听来的我在轻工学院说过的话拿出来批驳。陪同刘少奇一起去的余秋里也指责我，说，派工作组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做了，这有什么错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得不同他们进行辩论了。我说，派工作组是个形式问题，它本身是无所谓对和不对的。关键是看你派的工作组去做了什么。学生们的行动都是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工作组一进去就在学生中间“反干扰”、“抓游鱼”，要把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革命的学生打成“右派”、“反动分子”。现在这些大标语都还在，这些难道是对的吗？

这时刘少奇出来讲话了，他首先批评了工作组，说你们的工作是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的。在刘少奇讲话时，下面鸦雀无声，一个个都在作记录。然后刘少奇又替我说话了，他说，我批评你们，你们都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戚本禹批评你们，你们要这样对他呢？他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嘛。你们这是什么态度？有意见可以好好说嘛。

随后，刘少奇又在私下里对我说，有些情况你当时应该跟我们说嘛，你又不说。我说，伯达同志不是在会上都说了么。我还具体地说了陈伯达在什么时候，说了些啥。刘少奇听了也不响了。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在怪我没有把主席那里的反应跟他事先通通气。可是，主席没有交代让我跟他说的话，我怎么能跟他说呢？我若主动去跟他说，那不就犯了和田家英一样的错误了么。当然，当时如果他来问我的意见，那我是可以跟他说的，但他又没来问我。他那时一心“反干扰”、“抓游鱼”，精神亢奋，偏听王光美和那些大人物的。我即使跟他掏心窝子说实话，他也听不进去呀，弄不好再打我个“八司马”。

我在这个会上的讲话后来不知怎么被传出去了，第二天学生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说他们拥护戚本禹，反对工作组。还有些很偏激的大字报说工作组狗胆包天，敢攻击中央文革等等。我们在建工学院开会的时候并没有学生参加，我也没有跟学生接触，开完会就回钓鱼台了。刘少奇不会去传，谷牧、余秋里他们更不会传，那学生怎么就知道了呢？我估计是工作组里的人告诉学生们的，工作组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二天，刘少奇的脸色就不是很好看了，我想，他一定认为是我去给学生报的信。可是他不来问我，我也不必要去作什么解释了。

我把在建工学院遇到的事情都向江青汇报了，江青告诉了主席。江青告诉我，主席就讲了一句话，“东海龙王想退兵，虾兵蟹将不肯听。”

## 5、两起风波

江青去了北京大学，她在北大发表的讲话中，坚决支持了革命群众。江青的讲话很受北大师生的欢迎。

在江青讲话的过程中，底下有人递了张条子给江青，条子上写着。我们系里有一个人，自称是毛主席的家人。可她老是支持工作组来整我们，她说工作组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请问江青同志，她是不是主席的家人？她为什么要支持工作组？

江青看了纸条很生气，当场就把纸条上所说的那个人讲了一顿。这件事当时在群众中还很引起了波动。

在江青讲话的时候，我正坐在她的边上，周围还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人。

过了一天，李讷来找我。她跟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给你，请你不要干预我们的家事”。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昨晚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引起了主席的误会。我就跟李讷说，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怎么会去干预你们的家事呢？可李讷说：“这我相信。但爸爸让我带话给你，我总是要带到的”。听了这话，我也无话可说了。我想，很可能主席怀疑这件事是我告诉给江青的。其实知道这事的人很多，江青并没有瞎说，她说的都是事实。只是在这样的群众场合下说这事，也确实是不很妥当的。主席是知道我经常给江青反映情况的，江青在向主席汇报时候，也常常会说，本禹怎么说怎么说。主席就有一个印象，江青的许多事都是听我汇报的。可是这件事却真的不是我汇报的，其实在这之前，我连那人是在北大念书的都不知道。但是主席叫李讷带话给我，我也不能再去向他作解释的，甚至在江青那里，我也不好去说的。我只好把主席的话谨记在心了。后来主席见到我的时候，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派到北京中学里面的工作组，有许多人都是从中央团校调去的。一次，王力到了一个中学，非常激烈地批评了工作组，他当场指着学校工作组的组长说，你站起来，我现在代表中央文革宣布，撤销你的工作组组长职务。那位组长在被王力宣布撤职后，就被学校里的学生给打了，打得很惨，伤得很重。中央团校的人抬着被打伤的工作组组长到中央文革来告状。他们一起到了中央文革的接待室，一口咬定是王力叫人打的。接待他们的人马上把情况反映到了我这里，我不相信王力会叫人打他的。只是在王力讲话以后，那位工作组长挨了学生的打，两者有点关系，但不能说是王力叫打的。中央团校来的人还说，戚本禹是从我们中央团校毕业的，我们要找戚本禹。我那时离开团校已经十六年了，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说啊？我就让靳耀南去听他们的意见，同时，派了中南海的一位医生陪同被打伤的工作组长去医院治疗。还答应他们，等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回来以后，马上就向他们汇报。这样才平息了这件事。

## 6、1966年7月29日的撤销工作组大会

主席在连续几天所作的谈话中，都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运动。1966年7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毛主席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这个文件修改后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在会上毛主席提出撤销工作组。7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各个学校都有学生代表去参加开会。不知道汪东兴、童小鹏他们是怎么组织的，我听说来开会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工作组的那些学生，其中很多都是些高干子弟，真正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很少。我就叫人马上去通知地质学院、北师大和北航等学校批评工作

组的师生代表，叫他们组织造反的学生和受压的群众也来参加大会。我写了条子，让大会堂的警卫人员放他们进去。警卫问我，安全问题怎么办？我说，安全问题由我负责保证。这些人都是受打击的，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难道他们还会带什么武器进来？再说那时候已经有安全检查的仪器了，如果有枪的话，马上可以检查出来。可是警卫们还是不放心，就把他们全都安排去了三楼。这样一来，三楼成了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集中的区域了。

在会议开始之前，我照例要到到会场的四周去查看一下的。当我走过距离会场最近的北京厅（即118号）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吴旭君和徐业夫，他们还跟我打了招呼。我知道，毛主席也来了。

可是主席并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持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在会上对工作组的问题作了点自我批评，可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来进行自我辩解。总理也在会上发了言。但总理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承担了派遣工作组下去后整了学生，他也有责任。

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照理说开这个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推行的派工作组整学生的错误的。可现在却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自己来掌握会议，这样一来，大会就变成了一个他们作向我辩解的会议了。而且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大会上讲了话，给人看上去好像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要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感觉。

正好这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人员来找我，他告诉我，很多学生都有意见，他们说刘少奇是镇压他们的，现在他们倒都来了，毛主席却没有来。连王光美都来了，江青为什么没有来。于是我就和办事人员说，你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一直喊，毛主席不出来，就不要停。办事人员马上去和造反的学生代表们说，学生们就喊起来了“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先是从三楼，然后二楼、一楼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能见到毛主席，谁不愿意啊。喊声持续不断，越喊越响，震耳欲聋。开始是坐着喊的，后来大家都站了起来，连坐在前面主席台下面一排的中央领导也都站了起来。那么多人在一起喊，那声音震耳欲聋。那时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千万别引起楼板的共振。学生们足足喊了有十多分钟，这时候，毛主席从主席台后边走了出来。这一下，全场的气氛顿时达到了高潮。“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整个大会堂。很多人没想到他们喊喊要见毛主席，毛主席就真的出来了。毛主席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就从主席台的这一头慢慢地走到了另一头，他一走，一边不断地向学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走到了主席台的中间转身回去了。

□ 摘自《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

【史实辨析】

关于《戚本禹回忆录》的对话

• 唐 燕 •

A：你的上篇博文，用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莽东鸿文章中关于撤销工作组大会的多人回忆，与戚本禹的回忆一“比照”，真假立判，也使戚本禹现了原形。可是，你为什么连一个字的评论都不写呢？

B：评论《戚本禹回忆录》这个题目太大，不是我能驾驭得了的，它披露出的很多所谓高层斗争和内幕，比如关于《5·16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有无毛在滴水洞给江青的

信，关于林彪写的“叶群是处女”的证明等等等等，也不是我这等草民能一下子都分辨得出真伪的。

可是66年7月29日撤销工作组大会是咱们都经历过的，那天人大大会堂座无虚席，有一万五千人出席，那一万五千人里主要是咱们北京中学生，北京各中学很多学生都去了，无分什么派，根本不是戚本禹说的绝大部分参会者是保工作组的保守派。我印象那个大会是因为第二天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就要全撤了，在撤之前，也就是所谓各校处于“权力真空”之前，中央召开的一个十分罕见的群众大会，给大家一个说明，一个交待。

那天我就在二楼观众席，印象最深的就是刘少奇还没讲完，毛主席突然从主席台一侧缓缓地走出来，面带微笑，却一言不发，用力挥动右手，也就几分钟又从主席台另一侧离开了。那天我另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刘少奇讲话时说的那句他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怎么搞文化大革命，他也不晓得。

A：没错，那天毛主席出现得太突然了，谁也没想到。有一瞬间大家都愣了，一两秒钟后才回过味来，接着大家就使劲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一句话没说，不一会儿就离开了。莽东鸿的文章收集了从大会主持人李雪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到大学生、中学生们对这次大会的回忆。他们全都众口一词说毛主席那天是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根本不是戚本禹说的什么先是观众席三楼上的学生开始大喊“我们要见毛主席！”，然后传到二楼、又传到一楼，全场一起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把毛真的喊出来的。

B：李雪峰、穆欣、还有那个北大数学系的学生、那个叫郝一星的中学生都用了“突然”这个词，毛主席“突然出现”、“突然走上主席台”、“突然从后台走出来”。和我当时的感觉一样，就俩字——“突然”。

A：那天咱们被车送到大会堂就特兴奋，好多同学是第一次进大会堂。我之前虽然去过人大大会堂，但那是被家长带去参加娱乐活动的，这回是以自己的身份出席大会堂的会议，所以特骄傲、特自豪。会上那么多中央领导人都来了，邓小平还亲自给大家讲话，个个受宠若惊。清华附中宋柏林那天的日记写得最真实：邓小平讲完话后，李雪峰突然宣布周总理讲话，这又出乎大家的意料，就更激动了。总理讲完了，刘少奇又讲，真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刘少奇快讲完时，毛主席又突然走上主席台了，大家那个激动劲儿就别提了，真的是全场沸腾！

B：那时的中学生特单纯，66年7月29日大家根本不知道工作组是刘邓派的，毛是反对派工作组的，更不知道刘邓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搞文革就是要打倒他们。所以无论是邓小平、周总理，还是刘少奇亲自出来给中学生讲话，大家都特有幸福感，当时根本没奢望毛主席也能来，所以毛一出来，陈凯歌的回忆用了“惊愕”这个词。

A：戚本禹的回忆描述得就好像毛出现在主席台是他临时安排似的，他可真够能吹的！你这么一比照，就实实在在地证明戚本禹纯粹是胡说八道！

B：没错，真假立判。可是那位什么“当代著名学者”何新居然评论说这是一本极重要难得的中南海文革往事历史实录，是第一手的政治文献，还说戚本禹会因这本书而“不朽”。还有个叫秋石客的，竟然称戚本禹为历史学家，真够能捧臭脚的！

A：现在文革话题被禁，文革档案不予解密，很多人就想当然地以为作为中央文革三大干将之首的戚本禹提供的都是第一手的文革资料，全盘吸收，信以为真。

B: 我感觉这本书仍像他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样，还是阴谋史学那一套，是用笔杀人。比如他说邓小平是“孽子”那段，先不论真假，那时邓小平才十几不到二十岁，戚本禹还没出生，他怎么知道的？显然不是第一手资料，可是他却把道听途说的东西确之凿凿地写进回忆录，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作为和道德吗？

戚本禹说，有一家美国出版社要用40万美金买他这本书的版权被他断然拒绝。后来有专家证实说这个说法是假的，出版他这本书的出版社也承认此说有误。仅这件事就说明戚本禹的人品不怎么样，这都不是记忆偏差的问题了。就冲他这种人品，再通过你这篇博文对撤销工作组大会回忆的比照，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他这本书披露的事情全都画个问号。

A: 前不久我就在网上看到了有个叫余汝信的指出戚本禹书中关于张霖之描述的种种不实。

B: 张霖之的儿子也写了反驳戚本禹的文章，网上能查到。相信今后随着越来越多文革知情者看到这本回忆录，对他的质疑会越来越多。

A: 人的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加上现在的很多回忆录都是经过大加粉饰的，都不真实。史科学讲求“孤例不证”，对任何史料都需要对比、考证、去伪存真，对戚本禹这种人的话就更不能偏听偏信。

B: 他在回忆录里丝毫没有忏悔之意，通篇都仍用文革的立场、思维、甚至用文革语言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吹嘘，自我炫耀，沾沾自喜于他当年一呼百应的威风 and 权势，用大量篇幅炫耀他与毛、与江青的亲密关系。他的回忆录就是为自己洗白、给自己树碑立传，为文革翻案，宣扬皇权文化。

A: 历史学是以科学性和真实性为基础的。既然他写的很多东西其真实性受到质疑，这本书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早在1964年他就“历史为政治服务”，按照江青的意思，由康生润色，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他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更是一篇“讨刘檄文”，被毛称赞是文革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

B: 他哪里是什么历史学家！他根本不具有历史学者的本分和良知，只不过善于揣测上意，唯毛是瞻，把自己的小聪明全都投入到了高层权斗中，甘愿充当毛打倒政敌的恶棍。

A: 他以他的文章多次被毛表扬为荣，文革中他到处支持造反派，组织批斗走资派，是文革的急先锋、马前卒，文革中就被冠以“小爬虫”，他被判18年是罪有应得，从这本书看，他也一点儿都不冤枉。

B: 司法给他的定罪包括煽动迫害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指使韩爱晶、王大宾对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策动聚众打砸抢等等。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大会就是他组织并主持的。

A: 他只不过跟江青一样是条主子让要咬谁就咬谁的狗，他的言行根本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作为。

B: 其实他只在文革舞台上得瑟了不到两年，就被毛、江抛弃了。

A: 他说他至今“想不清楚也说不清楚”毛为什么批准抓他。

B: 这也正是这位“历史学家”的悲哀，他根本没从历史的细节中爬出来，更没有历史的视角和眼光，所以他至今都没看清文革的本质是必然的。

A: 他出狱后，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世界也已进入和平与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新时期。他至死怀念闭关锁国倒行逆施的毛时代，根本没有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观和全球视野，更没从自己的文革境遇中接受教训。

B: 时势造英雄。我们诞生过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诞生过胡适、鲁迅、陈寅恪；诞生过顾准、张志新。如今曾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文革“小爬虫”戚本禹不仅又爬出来了，还受到许多人的肉麻吹捧，包括一些所谓名人、学者、党员干部，他们无视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早已盖棺定论，企图推翻决议为文革翻案。

A: 这是禁止认真反思、清算文革的必然结果，足够悲哀！

B: 是啊，从历史上看，只要专制制度不变，奴才文化就会盛行。

A: 这是个没有信仰、良知不足奴才有余的时代。

□ 来源：新浪博客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